

辽代北方民族的内聚: 辽宁地区的移民及其影响

肖忠纯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历史系,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辽代,东北地区处于大移民时期。由于辽宁地邻契丹内地,地旷人稀,且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更是移民频繁,规模空前。移民以内聚型流入为主,且多为战俘型移民。汉人和渤海移民居多,兼有契丹、女真、奚、西夏、新罗等族移民。移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辽宁地区大杂居、小集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态。在辽宁地区,辽河以西多为汉人,辽河以东渤海人居多,而其他民族则集中分布在若干州县和地区之内。这种内聚型移民促进了辽宁经济全面繁荣,城市建设兴起,交通线路得到改善,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

[关键词]辽代;辽宁地区;内聚型移民;影响

[中图分类号]K28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2)01-0066-04

在辽宁的古代历史中,辽代以前曾有山戎、东胡、秽貊、汉、乌桓、鲜卑、高句丽等多民族活动。由于多年战乱,唐代后期辽宁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口大量减少,地旷人稀。到了辽代,辽宁地区各民族人口状况发生了剧烈而频繁的变化。至今,学界针对辽宁地区古代移民和人口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对辽史和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研究。

一、辽代辽宁的内聚型移民

辽代兴宗以前,诸帝征伐不断,掳掠了大量人口,迁入上京、中京和东京道地区。与今辽宁地区相关的移民不仅频繁,而且数量众多。

自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1年任夷离菑以来,多次南掠中原、伐女真、灭渤海国,掳掠了大量人口。这些人口许多被安置在今辽宁地区。据《辽史·太祖纪》记载,神册四年(公元919年)二月,“修辽

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次年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今辽阳市老城)、沈州(今沈阳市)”;天赞三年(公元924年)夏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治今新民辽滨塔村)地”^[1](卷2《太祖纪下》)。另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壕州(今彰武县小南洼古城)、霸州(今朝阳市,后升兴中府)、黔州(今义县北)及其下辖盛吉县、锦州、沈州及其下辖乐郊县和灵源县、广州(沈阳市西南彰义站)、祺州(今康平市东南小塔子古城)及其下辖庆云县、银州(今铁岭市银州镇)、永平县、归州(盖州熊岳城西南归州)等州县为太祖时移民所建,宜州(今义县东北)也为太祖时所建。可见,太祖时期的强行移民已涉及辽东、辽西、辽北、辽南各个地区。其中,多数移民为汉人、渤海人、女真人也占一定数量。辽太宗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十二月,迁东丹国于东平(今辽阳市老城),徙渤海民户以实之,并升东平为南京。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共迁数十万渤海人于今辽阳市和海城、盖县、凤

[收稿日期]2011-07-20

[作者简介]肖忠纯,男,满族,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城等地区。此外,辽太宗继续派兵南侵中原,掳掠人口。数量重多的汉人俘户进入辽宁地区。《辽史·地理志》所载榆州(今凌源西十八里堡古城)、贵德州(今抚顺市城北高尔山前)、双州(今沈阳市西北石佛寺)等就是辽太宗时迁汉民所建。辽世宗统治期间,也曾南下掳掠。宜州弘政县(今义县境内)、海北州(今义县南开州屯)即以战俘建州。此外,还有非战俘型移民。如显州(今北镇),辽世宗曾“迁东京三百余户以实之”,其下辖奉先县、归义县、康州为辽世宗迁渤海人户置。穆宗、景宗两朝,进入辽宁地区的战俘型移民史籍无考,但穆宗朝有少量非战俘型移民,如显州山东县为“穆宗割渤海永丰县民为陵户”^[1]〔卷38,《地理志二》P.464〕。圣宗在位49年间,伐宋、女真、党项和高丽,获得大量战俘。据《辽史·地理志》载,顺州(阜新县大巴乡五家子古城址)、宁州(瓦房店复州城东北永宁城)即以战俘建州。圣宗朝非战俘型移民较多,主要集中在徽州(阜新县旧庙乡四家子古城址)、成州(阜新县红帽子乡古城址)、懿州(阜新县塔营子乡古城址)、安德州(朝阳市五十家子古城)、川州(今朝阳市东北四角板村)弘理县、来州(绥中前卫镇)、开州(今凤城)、辽西州(今义县东南王民屯)长庆县等。《辽史·兴宗纪一》载,兴宗朝也曾以重熙九年(1040年)十二月“以所得女直户置肃州(今昌图马仲河古城)”;重熙二十年(1051年)六月“诏以所获李元昊妻及前后所俘夏人,安置苏州(今大连市金州)”。辽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向今辽宁地区的移民史籍无考。

二、辽代辽宁内聚型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一) 移民范围广、次数多、数量大

辽代在辽宁地区所建一百余个州县绝大部分都涉及移民,几乎涵盖今辽宁各个地区。除了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外,其他诸朝都有移民,尤其太祖、太宗、圣宗三朝更是迁移频繁。总移民人数可达四五十万人,是辽宁历史上的大移民时代。

(二) 绝大部分为迁入型移民,对辽宁而言,属于内聚型移民

移入后迁出者主要是由于政策性考虑和叛乱等因素,数量很少。如圣宗在平辽东大延琳叛乱后,将东京辽阳城和海州的渤海户迁出。

(三) 以强制型移民为主,自发型移民较少

辽宁地区许多州县和皇族、大臣的私城是由战

俘所建,其他州县的设置也属于政府强制移民。

(四) 移民主要有战俘型和非战俘型两种

太祖、太宗时期为大规模战俘型移民,世宗到圣宗时期以非战俘型移民为主,兴宗朝有少量战俘型移民。

(五) 移民涉及众多民族,一般聚族而居,形成辽宁地区大杂居、小集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态

辽终一代,汉人、渤海人、女真人、奚人、党项(西夏)人、高丽人、新罗人等各族人口被强行迁入辽宁地区。此外,还有室韦、吐谷浑、沙陀、阻卜、乌古等部战俘和归附人口,可能是以从嫁户或从军人口等形式少量进入辽宁地区。这些迁徙人口多数被集中安置在某地以后聚族而居,这在大多数中小州县中表现明显。占当时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和渤海人也普遍聚族而居。到辽朝中后期,由于州县调整,在一些州县中才逐渐混居。

地邻契丹内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较好是人口大量流入的重要原因。由于隋唐时期东征高句丽,唐代的营州事变、安史之乱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导致辽宁地区地旷人稀,为人口的流入提供了可能。具体来讲,唐代,辽西营州辖区汉人主要居于柳城县(今朝阳市旧城),如今发现的唐代汉人墓葬均集中在朝阳附近即说明了这一点。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记载,柳城县“天宝,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可见人口非常少。此外,归营州都督府管辖的三十余个为契丹、奚、靺鞨等部落设立的羁縻州县,在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由于营州事变,大多迁移到今河北省和山东省。之后,又爆发了安史之乱,人口流散逃亡,因此辽西地区地旷人稀。而唐初辽东地区处在高句丽统治之下,人口较多,经过多次东征,人口也有所减少,之后局势相对稳定,人口情况稍好于辽西。到唐代后期,辽宁地区人口东多西少,辽西远远少于辽东地区,分布极不均衡。据研究,唐代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辽宁地区人口数约为35万人^[2]〔P.347〕,这一数字可作唐朝后期辽宁人口总数的参考。这为新移民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三、辽代辽宁各民族人口的分布

(一) 契丹人集中分布区

契丹官员、贵族及其家属、仆从在每个州县都有少量分布,尤其在东京辽阳府、兴中府(今朝阳市)等大城市相对较多。城市中有明显的等级分

区,一般设有毡帐区,在大中城市还建有内城和外城,将契丹统治者与各族百姓分开。另外,也有契丹牧民的集中分布区,如横州(彰武县苇子沟乡土城子村)为国舅萧克忠以部下牧人置,户二百;遂州(彰武县四合城乡大伙房土城子)为南王府五帐牧地,户五百;闾州(阜蒙县十家子乡)为罗古王牧地,户一千^[1]〔卷37《地理志一》〕。

(二) 渤海人集中分布区

辽太宗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共迁数十万渤海人于今辽东、辽南地区,使渤海人在辽河以东广泛分布。辽阳、沈阳、凤城、铁岭等地原即属于渤海国后期疆域,此时渤海人户又大量增加。而辽南的海城、盖县等地也迁入大量渤海户。后来,世宗、圣宗等朝又迁渤海户于今锦州市部分地区和葫芦岛的绥中地区。今锦州市的显州及其下辖奉先县、山东县、归义县、康州和乾州(北镇西南)下辖灵山县、司农县以及黔州(义县北)及其下辖盛吉县皆为渤海人集中分布区。圣宗平大延琳叛乱后,迁辽阳渤海人于今绥中地区的来州、隰州。除了集中分布区以外,也有零散分布。因此可知,渤海人在辽宁地区数量众多,甚至超出汉人的数量。

(三) 女真人集中分布区

辽太祖迁女真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称曷苏馆女真,设“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1]〔卷46,《百官志二》P.756〕管理其地。至辽末,共发展为七部^[3]〔卷66,《完颜胡十门传》P.1562〕。自辽阳以南,至今盖州、瓦房店,皆为其地,聚族而居。辽朝还有“南女直国”,为圣宗朝“伐女直”以俘获所置^[4]〔P.471〕,分布于今辽东半岛熊岳城以南地区,紧邻曷苏馆女真之南,由南女直国大王府、南女直汤河司进行管理。辽朝还有北女直国,主要分布于今新民、铁岭、开原、昌图一带,由北女直国大王府、北女直兵马司管辖。另外,今绥中地区的来州也为“圣宗以女直五部岁饥来归,置州居之”^[1]〔卷39,《地理志三》P.489〕之地。

(四) 汉人集中分布区

据文献记载可知,汉人集中分布在今阜新市、辽阳市、锦州市西部和葫芦岛部分地区及辽东地区的若干州县。今阜新市大部分地区。此地区大部分投下州是汉人俘户和媵臣户所置。媵臣户即从嫁户,其中大部分为汉人。今朝阳市大部分地区。兴中府及其下辖州县,川州及其下辖县以及中京大定府所辖榆州、潭州(朝阳市西黄花滩喀喇城)、归化县(朝阳市南部袁台子村城址)、金源县(疑今建平东北喀喇沁城址)等为汉人居住区。今锦州市

西部和葫芦岛部分地区。如锦州、乾州、宜州及其下辖州县,中京大定府所辖劝农县(锦州市凌海境内)、神水县(葫芦岛市邵集屯城址)等。辽东地区的若干州县。除了东京辽阳府有一定数量的汉人以外,沈州、广州、祺州、双州等州县以汉民所置,而咸州(开原市老城)、贵德州(抚顺市城北高尔山前)、开州(凤城)、海州(海城)等州及其下属县汉人和渤海人杂居。总体来看,汉人分布面广,辽西相对较多。汉人除了集中分布区外,也有零散分布或与其他民族杂居者。

(五) 其他民族分布区

辽西有奚人分布。辽朝有四大王府,其中辖奚六部的奚王府在奚族旧地,今辽宁西南的部分地区在其管辖之下。据《辽史·地理志三》载,利州(喀左县城东门外)阜俗县在“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统和四年置县”。可见,利州有奚人居住。据大安五年(1089年)石刻《萧孝忠墓志》记载“大辽国锦州界内胡僧山(今虹螺山)西廿里北撒里比部落,奚王府东太师所管。”^[5]〔P.416〕可见辽代后期,锦州境内也有奚人部落。

在辽东、辽南地区,还有一些高丽人,此时逐渐与各族融合。归州在圣宗伐高丽后,有新罗移民。苏州为兴宗重熙二十年以所获李元昊妻及前后所俘夏人置州。

总体来看,辽宁地区汉人、渤海人占人口多数,分布广泛。辽河以西汉人为多,辽河以东渤海人居多。而其他民族则集中分布在若干州县之中。

四、辽代辽宁地区内聚型移民的影响

(一) 经济全面繁荣

与以前历代相比,辽代是辽宁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期。首先,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和耕地面积扩大上,圣宗、兴宗时期,“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6]〔卷264,《宋琪传》P.9125〕;也表现在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辽宁北部和辽西均有大量的辽代铁制农具出土,种类较多,多与中原形制相同,说明以上地区深受中原的影响。昌图八面城(辽代韩州)、阜新红帽子古城(辽代成州)、北镇等地出土了铸造犁铧的铜范,并有契丹文印记。这种犁铧非用牛力不能牵引使用,也说明了铁犁和牛耕的先进生产方式在各地普遍

推广^①。因此,辽中期以后,辽宁地区粮食富足,许多州城建有粮仓^②,“辽东粟”甚至还外运到其他地区,救济饥民。其次,对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手山(今辽阳市首山)、广州、同州(今开原市南中固镇)东平县等移民所建州县铁冶发达^[1]。在纺织业方面,宋朝使臣路振所撰《乘轺录》记载,灵、锦、显、霸四州“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武经总要·前集》卷16引《北番地理志》称川州“地宜桑柘,民知织纴之利”,还有“民工织纴,多技巧”的宜州弘政县^[1]。而辽阳县的江官屯窑和贵德州境内的大官屯窑则是当时著名的陶瓷产地,其产品多仿制中原的定州窑和磁州窑,工匠多为中原汉人移民。另外,移民也使原来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得到了开发。如辽宁北部的阜新、康平、法库、开原等地区,隋唐时期人口稀少,行政建置很少,至辽代人口大量增加,行政机构达二十余个。到目前为止,仅阜新地区发现的辽代古城址就有27处^[7]。

(二) 城市建设兴起

由于移民的大量流入,辽宁地区的城市数量远远超过前代。通过文献和考古成果可知,州、县、军城总数达一百余座。而且,“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辽代城址来讲,其数量超过《地理志》所列州县军城何止一倍!”^[8]从数量上看,辽代城市是辽宁古代历史上最多的,城市几乎遍布辽宁各地,只有在今北镇至辽中之间方圆二百余里的沼泽地带未建城市。今辽宁省的许多城市肇基于辽代,如凤城、海城、盖州、熊岳、金州、复州、开原、北镇、喀左等。

(三) 改善交通线路

辽代以前,中原通往东北地区的陆路大道要经由大凌河谷穿行,一般称为辽西道(汉以前称卢龙道,汉称柳城道,唐称营州道),而辽东湾西岸与松岭南麓之间的辽西走廊,虽然路近且直,但一直未形成中原通往东北的主要通道。其主要原因是松岭处于沿海岸边,由于海浸海退而成为沙塞不毛之地,长期荒无人烟。到了辽代,随着移民的增加,辽西走廊沿海地区设置了来州(绥中前卫镇)、来宾县、隰州(绥中东北)、海滨县、锦州、永乐县、安昌县、神水县、岩州(兴城南四城子)、兴城县等州县,使辽西走廊一带得到逐步开发,从而促进了辽西走廊傍海道的开通。

(四) 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

伴随中原地区汉人的大量流入,汉族的官制、

文字、礼仪、服饰、饮食、宗教等有了广泛的传播。总体来看,辽宁地区民族融合的汉化趋势比较明显。但汉人在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等方面也出现了契丹化现象。在今阜新市和医巫闾山地区,汉人也从事牧业生产;汉人在饮食习惯上也慢慢发生了改变,除以谷物为主食外,也开始了“食腥饮膾”的生活;鸡冠壶、盘口长颈瓶等具有鲜明契丹民族特色的陶瓷用品在各地均较为流行;汉人被赐国姓,许多人也有契丹名字^③;在服装和发式上也受到契丹人的影响。

综上,辽代各民族人口的大量内流,给辽宁地区带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辽宁虽然不属于辽朝内地,但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要高于辽都上京及其周边地区,更远远超过东北其他地区。

[参考文献]

- [1] 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刘嘉麒. 东北地区自然环境历史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3] 脱脱. 金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 佟冬. 中国东北史(修订版)(第2卷)[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 [5] 向南. 辽代石刻文编[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 [6]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7] 张志勇. 辽金时期懿州历史与文化研究[M].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0.
- [8] 冯永谦. 《辽史·地理志》考补——上京道、东京道失载之州军[J]. 社会科学战线, 1998(4).

(责任编辑 何天明)

① 《辽史·地理志三》载,宜州为“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但据《王郁传》、《王悦墓志》、《王裕墓志》可知,太祖时已有宜州崇义军,辽志有误。参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1页。

② 参见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96页。刘颀《辽宁北镇县发现辽代铜犁范》,载《考古》1984年第11期。

③ 据《辽史》卷59《食货志上》记载,在东京地区,咸、苏、复、辰、海、同、银、遂等五十余城内,各有和籾仓,各仓所储粮食,“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